

# 记忆与历史的概念：古代与现代

宋秋明

**【摘要】**在西方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记忆研究中,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研究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将记忆与历史明确区分,并重视两者的差异性,是20世纪才出现的独特现象。从古代到19世纪,记忆与历史的概念一直保持着亲近性和一致性。对记忆和历史概念展开历时性的梳理,将有助于重新辨析20世纪以来的记忆和历史的观念与关系。

**【关键词】**记忆;历史;故事;不朽性

**【作者简介】**宋秋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文化研究》(京),2019.秋.61~83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记忆逐渐成为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热点。记忆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使其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都展现旺盛的生命力。综观这些研究,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对于记忆与历史关系的思考或许是20世纪后半叶记忆研究的起点,因为无论记忆还是历史,两者都直接关乎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和感知。而将记忆与历史对立起来,或是将两者的意义有意区分开,却是20世纪才出现的独特现象。<sup>①</sup>那么在20世纪之前,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漫长的西方文化史中,从古代到现代,两者的观念又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便是本文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为了能够勾勒两者观念变化的踪迹,本文将以历时性的结构展开。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概念的变化是线性的,相反,在新的观念出现时,旧观念仍具有相当强度的适用性。

## 一、古典时期

### (一)记忆:缪斯之母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口头文化社会,知识的学习和传播主要是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与此相对,书面文化是以文字书写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主导方式,它与印刷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古典时期,虽然口语记忆和书面记忆同时存在,但流传下来的书

面著作往往是口头文化的产物。故而古希腊和罗马人所谈到的记忆也往往是指口头记忆(记忆力),文字不被当成记忆的主要形式,而仅是一种辅助记忆的工具。从柏拉图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这种差别。他认为,文字的发明并非在帮助记忆,相反是在人们的灵魂中播种遗忘,久而久之,人们会越来越发依赖写下来的东西,而不再去努力记忆。换言之,文字的发明对记忆有害,它充其量只能起到提醒记忆的作用。<sup>②</sup>在口头记忆占据绝对地位的文化中,知识有赖于记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灵魂”)的先储存,待需要时再从中提取,在这一个意义上“学习就是回忆”。<sup>③</sup>这时的记忆被视为一个无所不包并可供随时提取的信息存储系统。人的口头表达能力、知识容量都直接取决于记忆。因此古人赞美拥有强大记忆力之人,记忆被视为美德。

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记忆与历史的对立不会出现。记忆作为组织一切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与历史始终保持着极其紧密的亲缘关系,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者被视为同义词。<sup>④</sup>古希腊神话为理解两者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图式:执掌记忆的女神谟涅摩叙涅(Mnemosyne)是主管艺术与科学的九位缪斯(Muses)之母,其中一位掌管历史的缪斯正是克里奥(Clio)。

维柯指出,古希腊人实际上是用寓言的方式,将

当时人们关于记忆与艺术、科学关系的看法保留在了神话中。维柯称,“记忆”一词的英文 memory 在词源上直接来自拉丁文 memoria。拉丁文的 memoria 与 memoria(记忆力)、reminiscentia(回忆)和 phantasia(想象力)同义。“拉丁人将存储各种感官知觉的能力叫作 memoria,而当它表露这些知觉时,他们把它叫作 reminiscentia;但它也意指我们形成意象的能力,希腊人称之为 phantasia(想象力),我们把它称作 imaginativa。因为,我们通常说 immaginare(想象)的场合,拉丁人说 memorare(记忆)”<sup>⑤</sup>这无疑揭示了古希腊人关于感官知觉、记忆与想象力这三者关系的基本看法。亚里士多德指出:动物都具有感官知觉,但不是所有动物的感官知觉都能够持续存在。感官知觉能被固定下来的动物,在感觉活动过去之后,它们的灵魂中会留下对逝去感觉的印象,当这种印象被不断重复,就产生了记忆。对同一事物的记忆不断重复,就会产生经验,而经验则是创制和科学(缪斯主管的领域)的前提。<sup>⑥</sup>这就得出了感知、记忆与想象关系的基本图式:感官知觉→灵魂(印记)→记忆→经验→创制和科学。维柯总结道:若要想象某个东西,除非先记住它;而若要记住某个东西,除非先感知到它。<sup>⑦</sup>因此,在古代,记忆作为想象和存储的能力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确早期“记忆”概念中所包含的储存和想象维度十分重要,20世纪以来针对记忆与历史的讨论总会回溯到记忆与想象、历史与想象的对照。

## (二)历史:讲故事的人

“历史”一词的英文 history 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 historia。根据词源辞典的释义,在拉丁语中, historia 是用来指对过去的事件、传说和故事的叙述;在希腊语中, historia 是指通过询问了解,或是复述某人的询问、故事、记录和叙述。<sup>⑧</sup>雅克·勒高夫指出, historie 源于印欧语的 wid-weid,从中衍生出的梵文 vet-tas 指“证人”,衍生出的希腊文 istor 指“目击证人”,而与其相关的 istorein 则指“设法了解”。由于古希腊人将亲眼所见视为获得知识的途径,<sup>⑨</sup>“历史”的最初含义便是:去看见,去了解。由此可见,当代所强调的“历史见证”正是延续了这一意涵。但在早期的历史

叙述中,除了讲述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外,更多的还是靠口口相传搜集而来。因此,古代历史概念的核心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而是追求不朽(后文详述)。直到中世纪,“历史”这一概念都与“故事”(story)无异。所以本雅明才会说:“古希腊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是希罗多德。”<sup>⑩</sup>

但是古代历史所讲述的故事,与今天意义上的故事大相径庭。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指出,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sup>⑪</sup>可见,历史所讲述的故事特指那些具有典范意义的伟大行动。以伟大、荣耀为标准所确立的历史是一个由典范故事所集合而成的宝库。西塞罗称“历史是生活之师”,就是由于人们认为过去的范例对当下的生活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而今天的“故事”概念已经大大失去了这种意味,故事更多的是对个体自身经历和感受的表达,它无关伟大与荣耀,相反强调它的平凡性和个人性。

在希罗多德那里,历史的出现与人们追求不朽的意识直接相关。所谓“不朽意识”,柏拉图曾言:“人的本性使我们……想要在世上赢得名声,不愿默默无闻地躺在坟墓里。”<sup>⑫</sup>在古代社会,这种不朽意识表现两种向度。

其一是诉诸自然,即获得作为物种的不朽。自然界本来就是不朽的、循环不息的,它不会因为某个个体的消亡而受到影响。人如果想要克服自身的必死性,可以通过物种繁衍的方式来达到这种不朽。柏拉图就持这种主张。<sup>⑬</sup>在物种不朽中,个体的存亡其实微不足道,它恰恰要取消个体性,转而强调作为物种的“人类”概念。

其二便是诉诸历史,即通过讲故事来获得不朽。这便是说,人在有限的生命逝去后,通过不断有人讲述关于他的故事,他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样一来,人就超越了必死的结局,从而获得如同自然一样的不朽。基于此,古代人才看重名声与威望。不同于自然不朽,历史不朽强调个体性和多样性,故事总是关于伟大个体的言行的,故事的版本也总是多样

的。希罗多德指出,语言、行动和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题材,正因为它们是独属于人的东西。<sup>①</sup>他们因为个体的存在而存在,随着个体的消失而消失。阿伦特指出,历史不朽通过事件的独特性来冲破自然的无尽循环,历史的意义通过个别事件来显现。如果要死的人成功地将某种耐久性赋予这些语言、行动和事件,使之免于淹没,那么这些事物就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不朽的世界,必死的人在万物不朽唯独自己会死的世界上找到了位置。<sup>②</sup>而在口头文化社会中,历史若想赋予这些易逝的言行以持久性,便只能依靠强大的记忆。这便是两者的最初渊源。

### (三)口头记忆与历史的形成

在口头文化社会中,历史主要是通过口头来讲述的,<sup>③</sup>今天看到的所谓古代历史著作往往也是口头记忆的产物。如果对古代历史(著作)的形成过程稍有了解,或许有助于理解记忆与历史的关系。

戈顿·施林普顿(Gordon Shrimpton)的研究表明,在口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历史(著作)的形成一般要历经如下过程:(1)历史学家收集与选定主题相关的人们的记忆(古希腊),或者是熟悉公共记忆(古罗马);(2)历史学家将从知情人那里搜集来的记忆归档(files)在自己的记忆中;(3)在脑海中组织出一篇文本;(4)再从记忆中写下;(5)将内容讲述回那些信息所来源的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将社区(community)对事件的集体记忆见诸文字。<sup>④</sup>让我们按照戈顿所提供的顺序依次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历史学家要收集与选定主题相关的人们的记忆或者熟悉的公共记忆。这些所要搜集的记忆包括实地考察关键人物所在的城市,搜罗相关的档案、记录和演说词、公共纪念碑、公共场所出现的题词,以及盘问健在的亲历者等。<sup>⑤</sup>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追求现代历史所强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相反,古代历史学家对此并不过分看重。希罗多德就指出:“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sup>⑥</sup>修昔底德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声称,他所讲述的历史一部

分来自亲身经历,另一部分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这些内容单凭一个人的记忆很难逐字逐句记下来。<sup>⑦</sup>所以,尽管已经尽可能用了最严格的方法来检验,但真实的情况仍不易获得。<sup>⑧</sup>换言之,口语转述的记忆存在相当强的易变性,所以记录历史的人并不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相反,他们强调故事本身的优先性,保存伟大和不朽的名声更为重要。而针对口头记忆的易变性,纪念碑、题词、铭文等物往往充当着一种助忆工具,提醒人们回想伟大故事。

其次,历史学家一边四处搜集相关的记忆,一边要将搜集来的记忆进行保存和整理,以便为后续的讲述与写作做准备。在没有印刷术和纸张的古代,保存记忆的难度远超今人的想象。面对数量巨大的演说词、对话、碑文等材料,历史学家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记忆力,因此提升记忆力的训练变得重要。记忆术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古代记忆术是作为一种修辞学技巧而被传授的,其目的主要是便于演讲人发表长篇演说。在面对杂多的记忆对象时,古人往往是通过抓住要点(提要)的方式来整合记忆的:记住关于事件的要点,而非全部细节。<sup>⑨</sup>在此意义上,所谓历史的“确凿性”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大体上不差”。以提要的方式来记忆和讲述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荷马史诗》。

要点提炼之后,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码放这些记忆。这种“有序存放”的记忆术原理,源自古希腊诗人西蒙尼戴斯的发现。相传,西蒙尼戴斯在参加宴会时恰好中途离场,宴会的屋顶突然坍塌,所有宾客被压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而西蒙尼戴斯通过记住每位宾客的座位位置来辨认死者。此后,他便意识到了有序排列是巩固记忆的要诀。古典记忆术正是在这一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场景和形象是古典记忆术两个核心构成要素:场景是存放记忆的位置;形象则是需要记忆的内容的形状、标记和影像。在古典记忆术中,对这两者都有更为具体的规定。比如,场景最好选择不规则的空间且光线明亮,不同场景间的间距适中;而形象的选择也最好是生动的、鲜明的和不寻常的。<sup>⑩</sup>古代历史学家也熟谙此道,并将其运用于历史讲述之中。修昔底德在讲

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他将一年分为夏、冬两季,又依次排列20个年头来讲述故事。戈顿指出,这是一种记忆术的方式,提醒听众要在脑海中设置20个场景来有序存放这些故事。<sup>③</sup>

再次,先在口头创作,然后凭着记忆将其写成文字,这是古代书写的常态。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指出:“在脑海中从头到尾地捋顺了自己的思路,然后,把它写下来,这个时候,因为他在脑海中已经把一切顺序都理好了,所以他好像正从书中复制一般不停地写着。”<sup>④</sup>但这种写作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由于大脑组织起来的记忆是线条性的,故而在讲述历史时往往呈现一种“无缝叙述”(seamless narratives)<sup>⑤</sup>,在表达时无法随意倒回去修改。所以研究者指出,希罗多德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他忘了某个信息或者犯了某个错误,他总是在意识到的时候马上停下来进行补充和修订。<sup>⑥</sup>这种立即补充的方式,显然是受制于口语写作的结果。到了古罗马时期,上述这种情况在方法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昆体良在用口语写作时,会留下一定数量的空白页,以便可以过后修补。<sup>⑦</sup>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家境富裕的写作者往往是将他们所思的内容直接口述给书记员的;直到14世纪,这仍是通行的惯例。<sup>⑧</sup>

最后,作为讲故事的人,历史学家会带着手稿回到公众中去,将这些故事再次讲述给那些社群的人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讲述者会反复完善和更新这些故事。比如,如果有新的听众加入或面对不同的群体时,讲述者会随之调整他要讲述的内容和手稿。在这一过程中,记忆与历史水乳交融:搜集来的记忆变成了历史故事,而当这些历史被讲述回它来自的社群时,就又融入了人们的记忆。但随着听众群体的变化,或是当听众对讲述内容提出意见时,这些听众的记忆和意见又可能会重新流入史学家的记忆库中,并重塑历史表达。因此,这些今天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古代历史著作,在其成书之前,可能经历了数次上述的过程。

在古代社会,由于记忆和历史都不是以逐字逐句的方式流传的,所以这种口头记忆和口述历史具

有的流动性与变易性,就为利用记忆来塑造历史提供了可能。戈顿指出,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集体记忆主要在三种向度上发挥作用:其一,来自记忆内部,集体记忆是以相似性为原则的,它倾向于同化陌生的、异质的记忆;其二,来自记忆的基底,即社群内部事实上分享着大量深层的经验模式(集体无意识),这些深层的结构会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的感知;其三,来自记忆的上层,通过控制记忆叙述、清除不良记忆的方式来达到相应的政治诉求。对古希腊—罗马而言,出于对伟大、卓越名声的向往,通过清除不雅的记忆、宣扬光荣的记忆来塑造历史,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做法。<sup>⑨</sup>

## 二、中世纪

到了中世纪,记忆和历史的观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基督教思想的统治下,记忆被神圣化了,历史也成为神学的附庸,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产生根本性转变,记忆仍与历史保持着亲缘关系。中世纪处在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过渡阶段,口头记忆与书面记忆并存于社会生活中,并共同作用于历史。

### (一)记忆宫殿与圣化记忆

延续古典时代的记忆观,中世纪人仍将记忆视为一个可以存储事物形象并可供随意征调的存储系统。奥古斯丁关于记忆宫殿的表述便是最好的说明。他写道:“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堂,那里是官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库。凡官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度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sup>⑩</sup>中世纪依旧推崇拥有强大记忆力的人,无论在宗教生活中,还是在世俗生活中,记忆都成为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sup>⑪</sup>

当教会阶层几乎垄断了全部的知识生产后,记忆首先是被当作一种基本的宗教手段出现的。不同于古代社会中记忆所承载的宗教内涵(多神论),中世纪的记忆指向了唯一的上帝,并将其神圣性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通过对比古典时期和中世纪使用记忆的语境,便能感受到这种差异。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中写道:

尽量恳求诸神的帮助……但首要的是记忆女神……只要我能充分回忆和复述这个由梭伦带回的、由祭司们讲述的故事……我们要说的这场战争……至今已有九千年了。<sup>⑤</sup>

而在《旧约·申命记》中：

你们要谨慎，不可忘记上主——你们的上帝跟你们订立的约。你们要遵行他的诫命，不可为自己铸造上主所禁止的任何偶像。(4:23)

“你们要小心，不可忘记上主——你们的上帝”；不可忽略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法律和诫命。(8:11)<sup>⑥</sup>

由此观之，古典记忆被置于一种泛神论的宗教观之下，记忆女神作为缪斯的母亲，她的力量关乎能否更好地讲述和创造，故而复述故事时需要记忆女神的庇佑。但所要讲述的实际内容——这场战争——显然是属于人事，而非神事，完全可以归入希罗多德的历史范畴之内。但中世纪的文本则恰好相反，在《旧约·申命记》中，记忆被全然安置在一种铁律和具有训诫色彩的语境下，通过不断的询唤将记忆强制与唯一的上帝联系起来。久而久之，记忆被建构为一个极具神学色彩的宗教词语；此篇中“请记住我”“不可忘记”之类都指向上帝。

中世纪基督教的记忆主要是纪念耶稣，每年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封斋期、逾越节、五旬节等)都要举行礼拜仪式来纪念他。<sup>⑦</sup>同时，对于已故之人特别是已故圣人的纪念活动，也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基督教教义中关于救赎和末世的论说，使得中世纪的人们十分看重死亡、审判和来世生活，这就使得记忆与死亡被深度勾连。金伯利·里弗斯(Kimberly Rivers)指出，中世纪的人们热衷于向教堂捐赠各种绘画、圣坛、小教堂，这样做的用途在于：活着的人会在参加礼拜时看到这些捐赠物，听到死者的名字，保持他们的在场，为他们祈祷。在中世纪，对个人肖像画需求的增长，也往往与瘟疫所带来的死亡有关。<sup>⑧</sup>而实际上，中世纪人们对死者的纪念，并不是在鼓励活着的人记住世俗生活中的死者，而是为了提醒活着的人要记住为他们的灵魂祈祷。<sup>⑨</sup>人们相信，通过代为祝祷的方式，故去的人可以洗涤罪孽，

进入天堂。也就是说，一切纪念都是关于上帝和彼岸世界的。古代记忆对世俗伟大人物的强调，就被中世纪记忆中的永恒上帝所取代，人的世俗生活只为等待有朝一日向“上帝之城”飞跃，记忆中充满着对救赎和来世的希冀。

在中世纪，书面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口头记忆与书面记忆在此时达到了均衡。<sup>⑩</sup>尽管如此，口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12世纪，学校中的大师(master)赢得名声的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口头宣讲的能力。<sup>⑪</sup>其原因主要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面资料仍不易获得，手写的书面资料往往数量有限，并且几乎保存在教会和教会学校中；且受到纸张(羊皮纸)和装订条件的限制，其流通性和便携性很差。这就使需要四处布道和传教的牧师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在书面材料不易获取和携带的情况下记住更多教义。<sup>⑫</sup>于是记忆术在中世纪蓬勃发展起来。

承袭古希腊—罗马的记忆术，在中世纪被基督教教化了。在中世纪的大学中，记忆术仍然是作为修辞学被加以传授的，其间出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记忆图式。但总体上，中世纪的记忆术都没有脱离古典记忆术所开创的原则：场景加形象，即按照一定的顺序将要记忆的内容安置起来。相传西塞罗所撰的《献给赫伦尼》在当时产生重大的影响，但现在认为这本书并非西塞罗所作，作者佚名。除此之外，古罗马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和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也为当时教授记忆术的僧侣所熟识。除了古典记忆术提供的方法之外，中世纪的僧侣还借助冥想和教学法实践等来增强记忆。

当然，除了书面材料不易获取和携带的原因之外，记忆术发展的另一更重要原因来自当时被教会阶层垄断的书面语与民众所使用的口语之间的鸿沟。中世纪的书籍和笔记往往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往往是各地的方言。<sup>⑬</sup>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转换问题使得牧师很难照本宣读。这种不逐字逐句的口头宣讲显然更具灵活性。正如古代演说一样，牧师们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听众和主题对布道的内容进行临时调整。能否记住更多教

义就成为推动记忆术发展的关键。中世纪的记忆术虽然延续着古典记忆术的原则,不过往往采取了更具宗教性的图式,如六翼天使,以天使的翅膀和羽毛为记忆图式存放布道主题。<sup>⑫</sup>

### (二)历史:作为故事与神的业绩

在一定程度上,中世纪的历史编纂是对古典时代的延续。在比德(约673~735)《英吉利教会史》的前言中,闪烁着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影子。他写道:

事迹资料……部分从其他人的著作,部分从长辈传说那里获得……这本书的……材料主要是从前人的各种著作中搜集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事迹是我可能从可靠人士所提供的确凿资料中得知的……为了教诲后代,努力把从普通传闻中汇集起来的资料写进这本书的。这是历史的真正规律。<sup>⑬</sup>

引文中,比德对历史材料由来的交代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表述十分接近,历史是对典范故事的一种汇集,具有教诲作用,而区别就在于中世纪的历史开始重视书面材料。但总体上,正如柯林武德所说,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方法始终没有改变,历史学家仍然依靠传闻和传说来取得事实,缺乏对传闻内容的批判。<sup>⑭</sup>作为对传闻和传说的编纂与叙述,中世纪的“历史”与“故事”概念仍无实质的差别,中世纪历史著作中所充斥的大量神话足以说明这种故事性和想象性,格雷戈里所作的《法兰克人史》便是一例。这种历史与故事的一致性也充分地保留在了词汇上,除了英语中明确地将history和story作了分区之外,在德语(geschichte)、法语(histoire)、西班牙语(historia)等语种中,历史与故事仍都用同一个词来表示。

尽管都是讲故事,但中世纪与古典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历史是记录卓越、伟大人物的言行,而中世纪的历史则旨在记录神的业绩。彼得·伯克指出,中世纪的历史起源于复活节年表的页边空白,在页边的空白地方填满特定年份所发生事件的简要记录。<sup>⑮</sup>这种源起的差异和记录方式的演变,体现了历史时间观念的变化。当历史开始被独立撰写时,复

活节年表所采用的编年体就成为书写的惯例。编年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观的出现。古代社会的时间观一般被认为是循环的,<sup>⑯</sup>而在基督教的时间表中,明确规定了作为历史开端的创世,作为救赎时间开始的耶稣现身,以及作为历史终点的审判。<sup>⑰</sup>换言之,线性的时间观取代了古代的循环时间观,这就为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历史被视为一个具有目的的过程,而神的力量左右着历史进程。历史是神的计划的显现,而书写历史的意义在于获得上帝的启示。因此,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历史事件只是单纯地被罗列和记录,没有过多的解释。记录历史的人相信,这些事件本身就携带着关于上帝的某种启示信息,收集整理并记录这些信息本身就至关重要,它们都体现着神的业绩。

### (三)记忆与历史:口语与书面语相互支援

由于中世纪处在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过渡时期,中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在口头记忆与书面记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中世纪,口语与书面语、口头记忆与书面记忆之间,并不互相竞争对过去历史版本的叙述权和解释权,相反,两者还时常处在一种相互支援的状态中。<sup>⑱</sup>

首先是口头记忆。独立的文字书写与口语的分离是随着12世纪教会学校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拥有了独立的识字和读写能力,于是文字逐渐独立于掌握知识的人而存在。这种状况在中世纪早期尚不存在,在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形成过程与古典时代十分接近,区别就在于这时已经有不少书面记忆材料可以加以利用。但中世纪早期的书面资料多半不是用文字直接写就的,而是从口头记忆转化而来的。对于不识字的民众而言,他们接受历史的方式主要是从讲故事的人那里“听”来的,能够目览历史著述的往往是少数的识字阶层。对于识字阶层来说,不再靠“听说”而是通过阅读过去的文献档案来接受历史,甚至能够独立书写过去。这种新的获取知识方式的出现,实际上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感知和理解。

其次是书面记忆。事实上,中世纪所留下的文

字记录多数是与商业交易有关的材料。帕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指出,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文字记录,特别是法律交易方面的,主要与土地使用权的争端有关。因为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家庭来说,土地所有权极其重要。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与口语分离的文字档案,所谓的“文献档案”不过是对口头陈述的一种录写。在开庭时,这些记录往往需要被当事人当庭大声地朗读出来。<sup>④</sup>而在书面文化发展起来之前,每当出现交易和财产的争端时,纠纷双方的常见做法是抬出家里的老人来分说,老人对过去的口头记忆来说,实际是一种凭证。但随着与口语相分离的文字档案的出现,书面记忆最终演化为一种历史性凭证,被用来重构过去。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中世纪大量出现的家谱和城市史的编纂资料中。中世纪的庄园主为了抬高家族的声望,获得更好的家族联姻、土地和财产,往往通过编写家谱的方式来抬高出身。通过杜撰祖上与煊赫王公贵族的血缘关系,他们能成为豪门世族的后裔。对于城市史的编纂也是如此,城市通过吹嘘、罗列自己古老的过去和显赫的出身来提高威望。<sup>⑤</sup>这些都是通过杜撰书面记忆来完成的。

在更多的时候,口头记忆与书面记忆是互相支援的。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自然灾害或战争摧毁了文献资料的时候。一方面,当自然灾害和战争导致文献消失,口头记忆所讲述的历史对于保持和重塑人们对过去的延续感就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由文献消失所导致的史料空白也为篡改记忆和“发明传统”提供了机会。莎拉·福特(Sarah Foot)指出,发生在9世纪的丹麦战争使整个教区的生活都受到侵袭,修道院消失了,档案也不复存在,记忆、遗忘与沉默在塑造后代对过去的理解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sup>⑥</sup>莎拉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发明不是一个现代现象,早在中世纪人们就会利用历史(文献)的空白和口头记忆来创造、发明过去,从而建构人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与感知。这些被发明的过去被保存在历史著作之中,识字阶层在阅读这些文字之后,又将其口述给民众;久而久之,听众甚至以为出自书面文献的历史其实只是传说的故事而已。<sup>⑦</sup>

### 三、现代时期

16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大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记忆与历史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笛卡尔(或译为“笛卡儿”)的怀疑主义折射出对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不信任时,记忆作为一种感知能力,其可靠性也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进步、发展、客观性等观念进入了历史,作为故事的历史逐渐被作为过程的历史所取代。

#### (一)不可靠的记忆及其前现代印记

彼得·夏洛克(Peter Sherlock)指出,记忆在早期现代欧洲主要有三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它被用来描述回忆的过程,特别是在教学和科学的语境下;第二种用法,它用来指记忆的果实,文学题材的回忆录就被包括在内;第三种用法,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记忆作为一种追索过去的方式。<sup>⑧</sup>而关于记忆观念的新变化,主要是随着自然科学和书面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记忆不再被视为一种美德,而是被视为不可靠。

16世纪以来,特别是18世纪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书面文化占据了知识生产的主导地位。当人们对过去的感知主要通过阅读来获得时,口头记忆和讲故事的人便逐渐失去了尊贵的地位。这种状况在17世纪已十分明显。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发明的历程若非由文字记载保其持续推进,总是不能圆满的”<sup>⑨</sup>;笛卡尔也写道:“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内容写在纸上,就不要将其诉诸记忆……书写实践,依靠它的帮助,我们将不再依靠记忆,而是把我们必须记住的东西写在纸上。”<sup>⑩</sup>培根和笛卡尔的论述表明:早期现代的知识被区分为“保存在记忆中的”和“保存在文字中的”两种,但记忆中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保存在文字中的知识才可靠。

造成对记忆不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印刷术的冲击,这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前现代社会之所以高度依赖记忆,是因为除了依靠自身的记忆力之外无所依凭,记忆力是获得知识最直接和节约的方式。印刷术的发展使知识能够独立于存储知识

的人而存在,关于过去的知识变得唾手可得,这根本性地改变了前现代的记忆习惯。记忆术的衰落正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叶芝指出,记忆术正在从欧洲传统的神经中枢被移除,逐渐被边缘化了。<sup>④</sup>但这一过程十分缓慢。培根曾这样评价记忆术:“在人的大脑中,存储了大量的记忆,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练习都有可能达到令人惊奇的地步,我也只是把它们看作跟翻筋斗、走绳索、跳舞等一样,只是一种心理的把戏。”<sup>⑤</sup>尽管培根将记忆术看作一种杂耍,但他的这番言论也从侧面说明,在17世纪,记忆术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流行,并受民众的喜爱。根据叶芝的研究,记忆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

其次,宗教改革,对记忆的不信任与宗教改革有着直接关系。自古典时代开始,记忆便与神秘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派那里,只有记忆的涌现才能带来不朽。<sup>⑥</sup>到了中世纪,记忆更是被当作一种基本的宗教手段和生活方式。而到了现代,对于记忆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由宗教改革的创伤和分裂所引起的。夏洛克指出,新教的意识形态不仅需要重新解释过去,还需要有意地制造遗忘。对“记忆”概念最致命的打击来自新教所宣称的炼狱不存在。新教理论认为,活着的人不能做任何事来拯救那些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帝手中的死人。换言之,中世纪开始的纪念行为便失去了意义。教廷发售赎罪券时宣称,通过购买赎罪券,人们不光可以为自己赎罪,还可以通过替死者祈祷的方式来为死者赎罪,从而洗涤已故之人的罪恶,使其升入天堂。而宣称炼狱不存在便切断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系,对死者的纪念变得不再重要。

最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记忆的不信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副产品。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直接导致人类对自身认识世界能力的怀疑,记忆作为人类的感官认识能力之一,也受到了质疑。此外,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不断发现新的和未知的东西,而非关于过去的知识。<sup>⑦</sup>指向过去的记忆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尽管有上述新变化,记忆观念中仍遗留着前现代的印记。

首先,记忆与不朽的关联。让-巴蒂斯特(Ar-gens Jean-Baptist)在1736年的书信集中写道:“这些都是伟大的行动,或是心灵的作品,它们确保我们在人类的记忆中不朽。”<sup>⑧</sup>这几乎是对古典记忆观的一种复述。尼古拉斯·罗素(Nicolas Russell)指出,在早期现代的文本中,集体记忆最常出现在这两类语境(荣耀的名声或是道德的典范性)中。<sup>⑨</sup>换言之,只有拥有伟大和美德之名的人才能在死后被群体铭记。这仍然没有脱离古典时期对历史与记忆的表述框架。尽管记忆的可靠性开始受到质疑,但是不少语境中,记忆仍与美德相关,铭记伟大和荣耀的过去仍具有教诲意义。

其次,记忆的群体性。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划分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哈布瓦赫系统地使用“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之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表述群体性的记忆。尼古拉斯·罗素在研究中表明,在哈布瓦赫之前,法语“记忆”(mémoire)是一个抽象性的集合名词,人们仅用这一个词就可以表示一种“群体记忆”(group memory),偶尔也会用“人类的记忆”这样的词来侧重表达记忆的集体性。<sup>⑩</sup>这种状况可视为一种前现代的遗留。在前现代社会中,只有精英阶层才拥有“制度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sed memory),因为这种制度化的记忆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普通人身上。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认为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将过去记录或者保存下来。<sup>⑪</sup>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现代的个人回忆录往往不会对个体的生活经历进行表述,而仅仅只是记录一些事实。<sup>⑫</sup>换言之,在前现代社会中,除少数进入集体记忆的精英之外,个体实际上是匿名的。让我们再次回到希罗多德的表述: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这实际与当代我们对记忆的用法大相径庭,当代自我之所以记忆,是因为它是属于自我的个体故事,它可以无关人类,而只对个人来讲意义重大。因此,尼古拉斯·罗素强调,现代记忆更多是作为一种独立和抽象的信息而存在的,并非一种经历,这无疑与前现代作为存储系统的记忆一脉相承。而将记忆视为特殊群体的生活经历这一观念,是直到19世纪末才普遍出现的。<sup>⑬</sup>

## (二)作为过程的历史

发源于16~17世纪的现代历史观念,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大发展与文艺复兴的兴起而出现的。此时,“上帝创造自然,人创造历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换言之,现代历史似乎体现着对古典人文主义的一种观照:历史不再是上帝的计划,而是重新以人为中心。但“人”重新出现在现代历史观念中却有着全新的语境。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颠覆人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基本判断,人曾经认为凭借自身的感觉经验可以认识世界,掌握真理。但望远镜的发明使人意识到眼见并不为实: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相反,地球是在绕着太阳转的。人的感觉经验不但不会带来可靠的知识真理,而且还会带来谬误。于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质疑成为普遍语境,它集中体现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普遍怀疑论”中。

但这种“普遍怀疑论”并未全然走向虚无。以维柯为代表,他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并将超出认识能力之外的自然界交还给上帝,声称只有创造它的上帝可以认识;同理,由于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可以认识历史,找到规律。<sup>⑥</sup>维柯揭示人的认识能力可以获得确凿的知识,但前提在于:人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于是,似乎人们一旦知道眼前的东西是如何一步步制作出来的,了解制作的过程,就能够认识它、获得可靠的知识。从此,现代知识的关注点就从“是什么”转向了“如何”,对过程的兴趣也就取代了对事物本身的兴趣,从而使事物成了这个过程的副产品。<sup>⑦</sup>久而久之,作为过程的历史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作为故事的历史。

阿伦特指出,在作为过程的历史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的一套以制作为核心的逻辑。<sup>⑧</sup>制作活动不同于人的行动,人的行动的特点是:其结果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存在风险;更重要的是,行动很难持续,行动在实施之后就结束了,故而古代的历史与记忆才想要留住那些易逝的行动。但制作活动则不然,制作活动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它依据一份制订好的蓝图,按照一种线性的流程和模式来制作,最终要完成一个成品,它有着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而且这个制成品往往更具持久性。在制作的逻

辑下,历史变成了一个人造的过程,它带有目的性和方向性。某种程度上,现代历史的这种线性时间观,可以视为中世纪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的世俗版本,但它取消了作为“末日审判”的时间终点,<sup>⑨</sup>从而将其推向一个值得期待却无限遥远的未来。

启蒙以来,在理性的旗帜下,进步与发展一直占据着现代历史观念的中心。这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前现代的博物学家往往秉持一种物种不变论和神造论,可到了18世纪,以布丰和拉马克为代表的博物学家认为物种是在不断变化的,于是物种演化理论开始流行;到19世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后,进化论逐渐成为常识。<sup>⑩</sup>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便表达了这种进步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当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意追求目标时,其实是在不自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无法察觉的自然目标而前进的,是为了推动自然目标而在努力着的。<sup>⑪</sup>在此意义上,已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代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的,每一个世代都把自己的启蒙留传给后一个世代,直至发展到充分与其目标相称的阶段,即人类的理性逐渐从一种不成熟状态发展成完满的人性。<sup>⑫</sup>在康德那里,不光可以看到历史的线性发展论和目的论,还能看到一种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两者都被统辖在过程之下,并在过程中被杂糅在了一起。

在古典时期,人们达成不朽往往诉诸自然,或是诉诸历史,这两种方式是有所区别的。但到了现代,这两者都进入了过程之中。将历史杂糅进自然进化过程的后果是,个体的存亡变得微不足道。换言之,作为过程的历史,并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相反,它将一切个体性和复数性的事件都吞噬进一个单一化的进程中,历史意义是通过作为总体的过程来显现的。而作为故事的历史则极为不同,作为故事的历史强调故事的多样性:讲故事的人往往游历四方,时而会聚在一起交换故事。那时的故事总有很多个,一个故事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历史意义不是通过过程而是通过故事敞开的。

在过程观念的支配下,现代学者致力于寻找一

种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法则和模式,并用这种法则和模式来解释历史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这种趋势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达到了极致。黑格尔将一切历史都最终归结为绝对精神,“世界历史在一般上来说,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sup>③</sup>世界历史表现为精神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整个世界最后的目的便是精神对这种自由的实现。<sup>④</sup>马克思则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解释一切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勾勒出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最终到社会主义的进步模式。在这些理论中,进步与发展的观念都占据着现代历史概念的中心。

除了进步与发展的观念之外,客观性也成为现代历史观念的重要内容。对客观性的追求源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论”;阿伦特指出,由自然科学带来的普遍怀疑,最后又反过来加剧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人们确信感觉和观察都不可靠的时候,自然科学逐渐走向实验。<sup>⑤</sup>自然科学的发现向人证明:在摒弃了自我的主观性转而采取一种客观的方法时,人就可以获得确凿的知识。科学实验的进展与影响力,使得与科学相连的这种客观性被纳入历史话语中。在启蒙理性崛起的时代,理性往往与这种客观性画上了等号。写一部客观的历史成为当时的信条。

在历史客观化的路上,德国史学家兰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兰克宣称从过去的档案中可以确知过去曾真实存在过,“如实直书”的方法可以使史学家超越任何党派的利益,书写不偏不倚和客观的历史。兰克将一种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方法应用到历史中,从而生成一套可重复操作的技术模式:(1)对原始资料进行审查确定事实;(2)不偏不倚地开始重构过去的工作;(3)在大量的证据中辨识出历史的因果关系。<sup>⑥</sup>这种方法旨在尽可能地剔除掉人的主观成分,不求为历史提供一种普遍化的解释,只求回答过去“实际上发生了什么”。<sup>⑦</sup>兰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史料考据训练,当这些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效仿德国大学开设教席,并将兰克的观念贯彻到历史教学中时,这种历史客观主义便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至此,我们会发现,现代历史观念是在一套背反

性的逻辑下确立起来的:人虽然重新回到了历史的中心,却是采取了一种自然化(非人)的方式。“上帝创造自然,人创造历史”这一命题,虽然意味着历史不再是“神的计划”,但它又再次陷落到康德所说的“自然计划”中。前现代历史作为故事所具有的复数性,被现代历史在对总体性的把握中取消了。康德“普遍历史”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都指明,个体的人是随时可供牺牲和抛弃的,只要作为物种的人类能得到充分发展。神学祛魅以来,将人再自然化成实现尘世不朽的目标,无尽的过程保障了这种不朽。当历史理性在无限地向客观性和科学性靠近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时,历史以摒弃人的主观性和感性因素的方式也将人清除了出去。于是,在现代,当人重新回到历史观念中时,个体的人被取消了,只留下了无尽的人类进程。

### (三)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记忆与历史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对人类的理解力及其各自对应的知识做出了明确区分:历史对应记忆,诗歌对应想象,哲学对应理智。<sup>⑧</sup>这显然还延续着古希腊关于记忆—历史关系的看法,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并未受到重视。培根的论述也从侧面表明,对于记忆的不信任,似乎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记忆与历史关系的基本理解。换言之,现代对记忆可靠性的质疑或许是“普遍怀疑论”语境下的副产品,客观史学的兴起并非否定记忆,而是试图通过史料考据剔除记忆中的虚假和主观成分,毕竟前现代的书面记忆中有不少是口头记忆的产物。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博物馆和档案馆的遍地开花,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逐渐被累积起来,这为19世纪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条件。

但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现代历史所讲述的记忆,往往经过了民族—国家框架的筛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区分两种记忆:(1)家庭/宗族记忆;(2)民族—国家记忆。而属于家庭和宗族的记忆由于平淡无奇而不值得记忆,真正值得记忆的是关于民族—国家记忆,这种记忆将以进入历史的方式获得不朽。<sup>⑨</sup>这无疑揭示了现代历史观念与民族—国家记忆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

洛伦茨指出,现代历史观念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诞生的,19世纪历史学家们所讲的历史就是民族史,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由于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学家提供资金,使其逐渐走向职业化的道路,历史学家在获得教职之后,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从而摆脱了业余身份,并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具备了中立和客观的条件。<sup>⑧</sup>正因如此,现代历史所叙述的记忆总是与民族—国家相关的。这些从档案记忆中被重建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又会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重新进入民众的记忆。法国在19世纪末推行的历史教育改革便是典型的例子,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法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分裂危机,历史教育承担起了建构共享记忆、统一民族身份感的重任。<sup>⑨</sup>

### 结语

从古代到现代,记忆与历史观念各自的内涵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于记忆而言,在古典时期,记忆被视为一种美德,并占据着知识文化中的绝对地位;到了中世纪,被基督教教化的记忆作为一种核心的宗教手段成为组织人们生活的重要原则;而现代印刷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记忆的地位开始动摇,作为一种主观能力,记忆开始不被信任。对于历史而言,历史观念主要经历了从故事到过程的演变。古典时期的历史记录的是伟大人物的言行故事,中世纪的历史记录的是上帝与圣人的业绩;到了现代,前现代“历史—故事”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过程观念取消了,历史被视为具有一个线性的和目的论的过程。但无论记忆与历史各自观念如何变化,两者始终保持着亲缘性,人们对于两者一致性和亲近性的认识——记忆是历史之母,远远大于对两者差异性的关注。

到了当代,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种一致性突然中断了。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使历史进步观首当其冲。宏大叙事的土崩瓦解,使作为过程的历史观念逐渐被摒弃:历史的断裂性而非连续性、历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被凸显出来。在历史的进步性和客观性备受诟病的同时,记忆被剥离出来,并在个体的维度上被赋予了积极意义。用克尔温·李·克莱因的

话说:在当代,记忆作为一种试图囊括各种术语的元范畴,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记忆取代了“自然”“文化”“语言”等这些曾与历史有对照关系的概念,成为与历史配对出现的术语,并重构着历史的边界。<sup>⑩</sup>而在今天,当我们试图进入当代关于记忆和历史所展开的思考时,总会不时地需要回到记忆与历史那古老的亲缘性中去,并从观念的谱系中观照如今两者之间微妙的裂隙与张力。

\*文中部分外文资料得到了帕特里克·赫顿教授的帮助,相关翻译问题曾得到张淳博士、钱子丹和言一的帮助,特此感谢。

### 注释:

①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梭(Henry Rousso)指出,将历史与记忆截然分开是20世纪才出现的特殊现象,在19世纪,特别是在法国,这种区分并不存在。参见Henry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9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转引自赖国栋《历史记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第7页。

②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197~198页。

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第77页。

④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指出:在当代,历史与记忆之间十分古老的一致性联系中断了,历史等于记忆这一观念终结了。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与记忆被视为一回事。参见[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5页。

⑤[意]利昂·庞帕编《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8页。

⑥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347~348页。

⑦[意]利昂·庞帕编《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第108页。

⑧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history>.

⑨[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14页。

⑩[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王斑译,[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第101页。

①[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

②《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第481页。

③柏拉图指出:“人类这个种族是时间的双生子 and 伴侣,决不能与时间分离,这就是人类不朽的性质。通过世代延续,这个种族保持同一,通过繁殖后代分有不朽。”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第481~482页。

④[美]汉娜·阿伦特:《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2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19页。

⑤[美]汉娜·阿伦特:《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28辑,第217~218页。

⑥由于历史主要是通过口语讲述的,所以接受历史的往往是“听众”,而不是通过阅读书籍来接受历史的“读者”。

⑦Gordon Shrimpton,"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Ancient Greece," McGill-Quee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23, p.26.

⑧Gordon Shrimpton,"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Ancient Greece," p.26.

⑨[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第525页。

⑩雅克·勒高夫指出:在口头文化社会中,不存在所谓“逐字逐句”的记忆。逐字逐句的记忆的出现是与书面文化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状况分不开的。参见[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中“记忆”一章。还可参见Jocelyn Penny Small, Wax Tablets of the Mind: Cognitive Studies of Memory and Literac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Chapter 12&13.

⑪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17~18页。

⑫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第137页。

⑬参见[英]叶芝《记忆之术》,钱彦、姚了了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第3~25页。

⑭Gordon Shrimpton,"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Ancient Greece," p.33.

⑮Jocelyn Penny Small, Wax Tablets of the Mind, p.160.

⑯Gordon Shrimpton,"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Ancient Greece," p.35,

⑰Jocelyn Penny Small, Wax Tablets of the Mind, p.188.

⑱Jocelyn Penny Small, Wax Tablets of the Mind, p.185.

⑲Jocelyn Penny Small, Wax Tablets of the Mind, p.160.

⑳Gordon Shrimpton,"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Ancient

Greece," pp.36-38.

㉑[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92页。

㉒Kimberly Rivers,"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in Stefan Berger & Bill Niven(ed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p.47-48.

㉓《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第349页。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㉔《圣经》,现代中文译本,http://www.godcom.net/xdzw/。

㉕[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第76~78页。

㉖Kimberly Rivers,"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pp.48-49.

㉗Peter Sherlock,"The Reformation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Susannah Radstone, & Bill Schwarz(eds.),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10, p.34.

㉘记忆的大致发展阶段分为:(1)原始社会:完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的“原始记忆”;(2)史前到古代,包括古希腊罗马:口头记忆和文字记忆并存,但口头记忆处于绝对支配地位;(3)中世纪:口头记忆和文字记忆各占一半,达到了均衡;(4)16世纪以后:书面记忆占据支配地位。参见[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第59~61页。

㉙Kimberly Rivers,"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p.53.

㉚Kimberly Rivers,"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p.54.

㉛Matthew Innes,"Memory, Orality and Literacy in an Early Medieval Society," Past & Present, No.158(Feb., 1998), p.10.

㉜参见Mary Carruthers,"How to Make a Composition: Memory-Craft 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p.23。关于中世纪记忆术的研究还可参见她的The Craft of Thought: Meditation, Rhetoric, and the Making of Images(Cambridge, 1998)以及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Cambridge, 1990)。

㉝[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9~21页。

㉞[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3页。

㉟[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高细媛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第14页。

④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将人类社会经历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后一个时代总比前一个时代要堕落,直到神干预后而重新回到黄金时代,如此循环。参见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9页。

④[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第160页。

④Patrick J. Geary, "Land, Language and Memory in Europe 700-110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9 (1999), pp.172-173.

④Patrick J. Geary, "Land, Language and Memory in Europe 700-1100," p.174.

⑤[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第162~163页。

⑤Sarah Foot, "Remembering, Forgetting and Inventing: Attitudes to the Past in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Viking Ag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9(1999), pp.190-191.

⑤Sarah Foot, "Remembering, Forgetting and Inventing," pp.191-192.

⑤Peter Sherlock, "The Reformation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Susannah Radstone, & Bill Schwarz(eds.),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pp.30-31.

⑤[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骏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3、87页。

⑤参见 Timothy J. Reiss, "Denying the Body? Memory and the Dilemmas of History in Descart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7, No.4(Oct., 1996), pp.600-601.

⑤[英]叶芝:《记忆之术》,钱彦、姚了了译,第121页。

⑤[英]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21页。

⑤[德]斯特凡·约尔丹主:《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8页。

⑤Peter Sherlock, "The Reformation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30-31.

⑥转引自 Nicolas Russell, "Collective Memory before and after Halbwachs," *The French Review*, Vol.79, No.4(Mar., 2006), p.793.

⑥Nicolas Russell, "Collective Memory before and after Halbwachs," pp.794-796.

⑥Nicolas Russell, "Collective Memory before and after Halbwachs," p.793.

⑥参见 Judith Pollmann & Erika Kuijpers & Johannes Muller, *Memory Before Modernity*,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 2013, p.4.

⑥参见 Judith Pollmann & Erika Kuijpers & Johannes Muller, *Memory Before Modernity*, p.16.

⑥Nicolas Russell, "Collective Memory before and after Halbwachs," pp.799-800.

⑥参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154页。

⑥[美]汉娜·阿伦特:《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28辑,第229页。

⑥关于“制作”观念的论述,可参见[美]汉娜·阿伦特的《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28辑)及[美]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王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中“工作”一章。

⑥[荷兰]克里斯·洛伦茨:《从历史到记忆:近代史学的时空框架与记忆研究的兴起》,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⑥参见[美]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徐长晟等译,第八章、第九章,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16页。

⑥[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第4~6页。

⑥[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72页。

⑥[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18~19页。

⑥[美]汉娜·阿伦特:《历史的概念:古代的与现代的》,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28辑,第227页。

⑥[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⑥[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第41页。

⑥[英]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第64页。

⑥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61页。

⑥[荷兰]克里斯·洛伦茨:《从历史到记忆:近代史学的时空架构与记忆研究的兴起》,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⑥参见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⑥Kerwin Lee Klein,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2000, NO.69(winter).